



编者按:第三届“伯鸿书奖”是由中华书局、桐乡市人民政府发起,联合人民网、中华读书报、图书馆报共同主办的一项公益文化活动。本届活动的一个单元是围绕《诗经》开展的主题读书活动,举行了阅读《诗经》征文活动,以及“阅读《诗经》经典图书十种”的评选。日前,第三届“伯鸿书奖”已落下帷幕,我们在此采访了本届活动的评委止庵先生,并约请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尹涛先生对“阅读《诗经》经典图书十种”一一予以点评,以供《诗经》爱好者参考。

止庵:《诗经》的读法

■采访:陈菁霞 苏恆森

中华读书报: 第三届伯鸿书奖“同一本书”主题阅读活动选出《诗经》作为共读的一本书,并且举办了阅读《诗经》经典书单评选活动,您作为这次活动的评委,先请您谈谈阅读《诗经》十种经典书单的评选结果好吗?如果选择三种由浅入深、由易到难的读本来读,您会选择哪三种?

止庵: 这十种书可以分为三个级别:第一级最浅,除了《诗经词典》之外,凡是附带译文的,如《诗经译注》等,都是初步读本、粗读读本;第二级是今人只注不译的,如程俊英的《诗经注析》;第三级是古人注本,其中又分为两种,一种如《诗集传》《毛诗正义》《三家义集疏》,它们不是欣赏类而是集注类,注疏内容相对深奥,另一种如《诗经原始》,属于欣赏类,是古人注疏相对浅显的。这十种书确实照顾到由浅到难的各个层次。就我个人而言,是不主张今译的,因为古文译成白话文就没法读了,尤其是《诗经》,翻译成白话文,一点诗的味道都没有了。如果让我挑三种书,由易到难,一种是程俊英、蒋见元的《诗经注析》,这是最浅的读本;第二种是方玉润的《诗经原始》;第三种我选三本,分别是《诗集传》《毛诗正义》《三家义集疏》,这三本书正好可以相互参照,不能相互替代。因为三家诗和毛诗不是同一派,看法不同,而朱熹的看法与它们又不完全相同。

中华读书报: 在您看来,这份书单没有什么重要的遗漏?

止庵: 问题倒不在于遗漏,而在于这里面有几本书属于“白话翻

译”。正如刚才所说,我很反对古文今译。其实不只是《诗经》,所有的古书,严格说都不应该今译,而应该根据需要作或略或详的注释。今译使得读者过分依赖译文,从而无法真正读懂古文。阅读古书有一个阅读能力的问题,古籍整理应该是帮人读懂原典,而不是用别的东西替代原典。将《诗经》译成白话,与这次活动的宗旨——使今天的读者能够接近《诗经》,而不是远离《诗经》——正相违背。我觉得这份书单里,以《诗经词典》作为辅助读物足矣,其他白话翻译的几种都应该舍弃。

中华读书报: 这次阅读《诗经》征文活动征集到数百篇稿件,进入终审的有50余篇,浏览这些征文,可对一般读者对《诗经》的接受程度、欣赏的方面有所了解,您这方面有什么印象?

止庵: 终审的51篇征文,我都完整完整地读过,觉得作者的水平参差不齐。有一些人泛泛而谈,感慨、议论并非针对《诗经》;有一些人则读得比较深入。当然我也并不太主张在一篇征文里写诸如考证之类的内容,毕竟这也比较偏,但还是应该读懂《诗经》,真有所感悟,发前人所未发。这里面像这样的论文大概有20篇左右,可以明显看出这些作者不是依赖白话翻译,而是真的热爱《诗经》、懂得《诗经》。总体而言,这次征文的水平还不算低,甚至比以前阅读现代人作品的征文水平更高,这倒颇为奇怪。其实《诗经》有一个门槛,需要你用心去读,如果过了这个门槛,就会有所收获。

中华读书报: 记得您在给扬之水老师《诗经别裁》所写的跋中谈到您读《诗经》偏爱文学的角度,相对的则是经学的角度,实际上,千百年来,经学一派还是主流,今天也有人赞成这一派,如刘毓庆先生认为《诗经》“经学意义要远大于她的文学意义”。我们当然不必去比较两者的对错和高低,但还是可以谈一下。您为什么不强调经学的角度?就文学而言,《诗经》的妙处何在?

止庵: 关于《诗经》本来就有多种解释,不只是从文学和经学的角度,名物学的解释也是一种方式,这在中国也是由来已久。扬之水老师的《诗经别裁》是文学的把握,而她的《诗经名物新证》则可归于名物学的解释,这应该说是她主要下功夫的领域,而《诗经别裁》在她也许只是《诗经名物新证》的余绪。《论语·阳货》:“子曰:‘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?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;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;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’”这里就包含了多种解释《诗经》的方法,其中“可以怨”大概比较接近文学的把握,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则是名物学或者说博物学的解释,而“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”以及“可以兴”“可以观”“可以群”都是社会学的解释,与《论语·为政》中孔子说的“诗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思无邪”,《论语·八佾》中说的“《关雎》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,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说的“放郑声,远佞人;郑声淫,佞人殆”等,大概一并可以归为经学的解释。我不太主张哪一种比哪一种更重要,也没有必要分出高下。

我自己不强调经学解释,原因

有四。第一,经学解释一直是传统的主流,比如之前说的《毛诗正义》就都是经学解释,《诗集传》大部分也是经学解释,朱熹是一位很有文学修养的人,《诗集传》里自有文学解释的成份,但当文学解释和经学解释冲突时,他就会倾向于经学解释。正因为经学解释在传统上一贯最强,我也就没必要再强调了。第二,我自己对文学和文学批评有兴趣,这里面还有可以发挥的空间,比如“赋”“比”“兴”三义是什么意思,三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。第三,要看《诗经》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作品,对此经学家和文学家有不同的看法,在我看来,《诗经》首先是文学作品,孔子说“郑声淫”“放郑声”,正说明连他也无法完全排除《诗经》里的非经学部分。而自从孔子提出“郑声淫”和“乐而不淫”之后,“乐”与“淫”变得对立冲突起来,反对“淫”的倾向经过朱熹的放大,使得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将这一领域放弃了,“淫”转到通俗文学里,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。本来中国文学有道德和审美两个路数,正因为过分向道德倾斜,使得“淫”这一审美因素受到压制,于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偏颇,这一偏颇甚至影响至今。第四,《诗经》与包括《楚辞》在内的其他先秦作品相比,有一个很大的不同,就是它充分地反映了我们的先民作为普通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。文学的《诗经》,其实并不只是文学欣赏的对象。文学终究是人性,《诗经》对先民的生活境遇和生存状态有真切的反映,这里有悲伤,有喜悦,有叹息,也有无奈。这

正是《诗经》的特殊性所在,如果将这一部分文学内容抽离出去,代之以仅仅是道理的阐释,未免是舍本求末了。

说到《诗经》的妙处,一方面,《诗经》字句特别精炼,换个说法就是有所局限,有时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,不能尽情描绘;可它的好处也正在这里,字句都特别管用,传神极了,如“鸡鸣于榭,日之夕矣,牛羊下来”(《君子于役》)、“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”(《风雨》),意境高绝,后人费尽笔墨不能道出。中国诗歌从四言到五言再到七言,从绝句、律诗到词的中调、长调再到词的套曲,字句、篇幅越来越长,古风也没有篇幅限制,但写相同的意境却难以超越《诗经》。另一方面《诗经》又不惜笔墨,《诗经》里的非经学部分。而自从孔子提出“郑声淫”和“乐而不淫”之后,“乐”与“淫”变得对立冲突起来,反对“淫”的倾向经过朱熹的放大,使得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将这一领域放弃了,“淫”转到通俗文学里,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。本来中国文学有道德和审美两个路数,正因为过分向道德倾斜,使得“淫”这一审美因素受到压制,于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偏颇,这一偏颇甚至影响至今。第四,《诗经》与包括《楚辞》在内的其他先秦作品相比,有一个很大的不同,就是它充分地反映了我们的先民作为普通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。文学的《诗经》,其实并不只是文学欣赏的对象。文学终究是人性,《诗经》对先民的生活境遇和生存状态有真切的反映,这里有悲伤,有喜悦,有叹息,也有无奈。这

中华读书报: 经学文学之外,当然还有别的读法,从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的理论出发,《诗经》则是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。另外博物学的读法自古以来也很流行,孔子所谓“多识

于鸟兽草木之名”,历史上的著述有陆机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等,今天这类谈论诗经中的植物、动物、名物的书更是不胜枚举。能否就史学、博物学之类的读法谈谈您的印象和体会?

止庵: 《诗经》确实有史学的读法,在《大雅》和《颂》里,有描写一个国家或一群人的经历,具有史学雏形的诗篇,这是直接的史;另外也有像“不稼不穡,胡瞻尔庭有县瓠兮?”(《伐檀》)这种具体与某一历史事件相挂钩的作品。至于博物学的读法,古往今来有很多著作,包括那些“图解”。在孔子的时代,人们能够看到的书很少,大概只局限于“六经”的范围之内,后来子部和史部的书才逐渐多了起来。在那个时代,没有独立的植物学、动物学、昆虫学,正好《诗经》里面涉及了一些鸟兽草木,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正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来的。通过后来一代又一代人对《诗经》的注释,一种依附于经学的植物学、动物学、昆虫学发展起来了,从这个层面而言,《诗经》的博物学解读意义重大。但是《诗经》里写到的植物、动物、昆虫毕竟有限,如今又早已有了独立的植物学、动物学和昆虫学,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再依附于经学了。当然《诗经》的名物学研究还是可以继续做的,我们仍然可以用现在的植物学、动物学、昆虫学来解释《诗经》。然而自然科学的性质与社会科学毕竟不同,自然科学是后出的替代原有的,至少也是后来居上;而社会科学是后出的补充原有的,后来未必居上,其间这种不同,也值得我们留意。



阅读《诗经》经典图书十种 (排名不分先后)

■点评:尹涛

1. 《毛诗正义》(全三册),李学勤主编,龚抗云等整理,北京大学出版社。在《诗经》的系列读物中,这部书当得起三个“最”:最基础、最重要、阅读难度最大。里面的毛《传》和郑《笺》,是现存最早且完整的《诗经》注释;孔颖达《正义》,集汉魏六朝《诗经》研究大成;整理本又依阮刻收入了《经典释文》。唐以前的主要研究成果,基本上都汇集到这部书里了。毛诗序不拘泥于诗的字面意义,进而研究诗的时代和用途;郑玄《诗谱》在此基础上,建构起恢弘的历史坐标——这都是研究《诗经》的正大方向。宋以后许多学者主张废毛诗序,也瓦解郑玄的《诗谱》,近代以来渐多学者专从文学上理解《诗经》,局部收获很多,积累也很厚,但都是在以《毛诗正义》为靶子,为巨人的肩膀。即以爱情诗而论,我们当相信毛、郑完全能读懂,所以不必沾沾自喜于时代进步和学术进步。从爱好进入到研究,《毛诗正义》是必过的津梁。

2. 《诗集传》, [宋] 朱熹集注, 赵长征点校, 中华书局。《毛诗正义》之后影响最大的

古代注解本,是《诗经》宋学的代表作。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解,都是长期甚至一生沉潜涵泳的结晶。《诗集传》下的功夫,可能是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外最大的一种了。他大胆突破一千多年来的汉学传统,废除毛序,只从《诗经》文本入手,同时慎重吸收前人成果,实事求是钻研诗义,发展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六义之说,形成了一套系统的、有说服力的《诗经》阐释理论。王力先生说“诗经的词汇,当以毛传、郑笺为主;毛郑不同者,当以朱熹《诗集传》为断”,这是语言学家角度的极高评价。《诗集传》注释亲切、简洁、明畅,至今仍是一个很好的读本。绕过朱熹而想深入《诗经》堂奥,可能会事倍功半。

3. 《诗三家义集疏》, [清] 王先谦撰, 吴格点校, 中华书局。东汉以来古文学派的《毛诗》成了《诗经》阐释的主流,但是在西汉还有三个地位甚至比《毛诗》更高的流派:齐诗(齐国辕固)、鲁诗(鲁国申培)、韩诗(今存《韩诗外传》作者韩婴),都属于今文学流派。毛诗占了上风后,三家的研究

成果逐渐散失。清代今文学复兴,王先谦在前人基础上,汇集三家诗说,又“窃附己意,为之通贯”,还把“毛郑二注,并列经下”,将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汇为一炉。好比《春秋》经文下附列三传,极方便比较研究,可收辨别是非、求同存异之功。这部清人研究《诗经》的名作,虽然贬抑《毛诗》,鼓吹今文,具有明显的倾向性,但客观上具有资料集成的价值,是拓展《诗经》研究的必备工具书。

4. 《诗经原始》, [清] 方玉润著, 李先耕注, 中华书局。原始,是“探求古人作诗本旨而原其始意”的意思。在方法论上,方玉润继承了孟子“不以文害辞,不以辞害意,以意逆志”的观点。今天看,《诗经原始》称得上是从文学角度研究《诗经》的一部经典。如讲《采芣》一“扫”“后妃之美”旧解,“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,恍听田家妇女,三三五五,于平原旷野、风和日丽中,群歌互答,余音袅袅……”,像这样的解说,开启了《诗经》研究的新路,对20世纪的学者影响较大。《诗经原始》新意迭

出,启人深思。要注意因为他的方法论的局限,对部分作品的解读,主观性可能稍强了一些。

5. 《诗经词典》(修订本), 向熹编著, 商务印书馆。这是“我国第一部音义兼备的专书词典”。向熹先生按现代词典的编辑方式,将《诗经》的全部文字打散,一一列为字头,加以音义方面的详细注释。注释先列出作者的定论,又截取舍历代《诗经》注释成果后,用功极深。案头必备此书,读诗遇到难解文字,可直接查询意义、读音,可看到历代权威解说,可查该字在其他篇章句词中的所有用法。作者从词义角度,对《诗经》进行了碎片化之后的重组和系统研究。比起一般《诗经》注本,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,确实是“阅读和研究《诗经》的桥梁”。

6. 《诗经选》, 余冠英选注, 中华书局。余冠英先生《诗经选》出版较早(1955),对《诗经》的普及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。全书106篇,每篇均来自异族的人侵,而非来自内部的农民起义。对于统治者来说,这无疑是有利的。该书以地方政治中的贪腐问题论析为主线,从赋役、司法等与

《诗经》做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介绍。和余先生选注乐府诗、三曹诗、汉魏六朝诗歌一样,注解部分功力深厚。有些学者反对今译,实际上今译和一切注解一样,都可看作答疑。何况余先生的今译,是很能传达民歌特点的。

7. 《诗经今注》, 高亨注, 上海古籍出版社。高亨先生《诗经今注》出版于1980年,是当代全本注本中出书较早的一部。他的目标是“依循它的本文,探求它的原意”,视野开阔,不专主文学立场。注释简明,文字、音韵、训诂方面功力极深。这个全本注本可看作是《诗经》注解中,继往开来、守正出新的一个典型。可惜普通读者对该书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。

8. 《诗经诠释》, 屈万里著, 上海辞书出版社。作者1952年出版《诗经释义》,影响台湾地区几十年,这是1981年的增订本,改名《诗经诠释》。屈万里先生为台湾权威学者,另有《尚书今注今译》等多种著述。《诠释》遵循傅斯年“欣赏文辞”“当历史材料整

理”“当代语言学材料书”三个研究《诗经》的态度,总的路线还是守正为主,可与高亨先生《诗经今注》比较阅读。本书附录诗地理图和古器物图,对阅读有帮助。

9. 《诗经注析》(上下册), 程俊英、蒋见元著, 中华书局。程俊英先生另有《诗经译注》,以普及为主;《注析》后出,是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注本中有深度的一种。每篇题解,小结前人旧说并出以己意,更加上一段艺术分析,要言不烦,具见精彩,是该书的一大特色。注释部分认真吸取前人成果,深入浅出。每篇附韵读,提示押韵。这个注本,可以帮助读者比较系统深入地走进《诗经》。

10. 《诗经译注》, 周振甫注, 中华书局。《诗经译注》在周振甫先生去世后出版,是他最后的一个经典注本。先生另有《文心雕龙注释》等,广受欢迎。他是做编辑的,很体会读者的需要。有今译,比较贴合原文。读这个注本,能时时体会到周先生那种嚼饭喂人、朴实平易、好学深思的态度。适合初学入门。

从地方政治看赵宋王朝的成败得失

■韩毅 刘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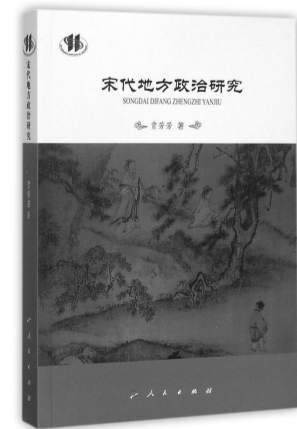
相对于宋代的中央政治而言,宋代地方政治的研究还相当薄弱,尚无系统性的专著。作为北京大学“宋代地方政治与社会系列研究丛书”之一,贾芳芳《宋代地方政治研究》的出版对宋代地方政治的研究颇多推进。

地方政治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政权机构设置和政务运作。该书详细地考证和梳理了宋代路、州、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建置沿革,深入探究了宋代地方官府日常政务的运行模式等,基本上再现了

宋代地方政治的真实面貌。基层社会治理,是历朝统治者都非常关注的层面。以往学界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,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角度,即多集中在中央加强集权的一面,从地方政治角度进行研究的却不多。这样单一的研究角度,难免会造成对历史的认识出现偏差。本书以地方政治为视角,叙述和分析了中央集权政策在地方的运转情况,对地方政权机构设置、地方官员的履职方式、地方官府日常政务的处理程

式、地方行政公文的运转流程、地方官员的任命及其对中央的态度、地方官府内部的关系、地方官场的风气、地方官府与豪强大族及普通百姓的关系等都有系统论述。书中指出,在宋王朝统治的320年里,除了小规模反抗,大的暴动基本没有出现。两宋王朝的灭亡也均来自异族的人侵,而非来自内部的农民起义。对于统治者来说,这无疑是有利的。该书以地方政治中的贪腐问题论析为主线,从赋役、司法等与

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指出:“深入研究地方政治,有助于深层次地剖析古代官场的各种积弊和腐败,理清古代政治的专制、愚昧和腐败基因的遗传密码。”诚哉斯言。“史学便是史料学。”该书作者广泛查阅正史、笔记、文集、奏议、地方志,以及今人论著、论文,重新审视以往政治史研究中未能充分利用的史料,对之进行深入解读和灵活运用。该书在史料的发掘、考证、解读等方面所下功夫是令人佩服的。



《宋代地方政治研究》贾芳芳著,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,88.00元